

洋务运动“幼童留美教育”何以夭折

黄炳琛

(重庆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 重庆 400047)

摘要: 洋务运动以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而宣告失败,作为洋务运动内容之一的“派遣幼童留美教育计划”却夭折于甲午战前的十多年,没能有幸与同样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派往欧洲学习的留学生那样如期完成学业。它的夭折除了“洋务”整个运动失败的原因外,从微观上分析这一具体的历史事件,可找到“幼童留美教育”夭折的一些特殊原因。

关键词: 洋务运动; 容闳; 幼童留美教育; 传统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29(2005)02-0070-05

1864年起清政府开始兴办军用、民用工业、开新式学堂、设立京师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为内容旨在“中体西用”以“强国”的洋务运动,以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遂告失败。关于洋务运动,史学界已有很多的研究,此不再述。本文试从微观角度分析洋务运动措施之一的“幼童留美教育”夭折的原因。

提到“幼童留美教育”不得不谈到容闳。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南屏镇(今珠海)人。自小在澳门、香港受西式教育,1847年初赴美求学,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系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为实现他的教育救国计划1855年毅然回国。从此为该计划四处奔走,1870年冬终由洋务派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等向朝廷奏准并成立“留美学生事务所”。1871年由容闳负责拟定留美教育计划。计划共招收12到15岁的幼童120名,从1872年起每年派遣30人,四年派完,每批学习时间15年。此“计划”由有留美经历的容闳负责拟定,应该说从计划理念、思维方式到具体实施,比起其它“洋务”活动来要轻车熟路。然而它没有存活到洋务运动失败的甲午年即早夭了,更没能象洋务运动期间政府派往欧洲学习的留学生那样如期完成学业。1881年清政府强行撤回了所有留美学生,此时连第一批学生也没完成学业而不得不“凄然返国”。^[1]

幼童留美教育的夭折,除了“中体西用”这一洋务宗旨导致整个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外,还有它的一些特殊原因,从幼童赴美前的种种迹象可以找到它夭折命运的潜在注释。

一、缺乏有力的政治背景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虽然封建统治集团里一些汉族地主阶级进步的思想家们开始思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主张其核心为“中体西用”。正如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的《变法》篇所说:“今诚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虽然在洋务过程中有的洋务官僚也看到了“西体”的优越,

收稿日期:2005-02-18

作者简介:黄炳琛,女,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研究馆员。

但其文化优越感并未动摇。如淮军大将两广总督张树声,在1884年病危时的遗折中谈到“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张靖达公奏议》第8卷)。一个务实的洋务派也以民族优越感说出西方“教育文化远逊中华”,就可以理解封建传统思想家不能摆脱统治集团“安身立命”的理论根基而获登彼岸。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受西方先进思想熏陶回国的容闳,纵然有“如珠”的质感,但他的孤零微弱使他在这个茫茫的大环境中几乎不能被人“看见”并理解。这表明要实现他的教育计划将是一条艰难的历程。

容闳回国不久,为了使他的思想为人们所认识并尽快融入社会,他不仅加紧补习早已生疏的本国语言,“重新穿上了本国服装……但他还是非常孤独和寂寞的”。在浓厚的封建思想笼罩下,“听过他倡议的人,大多漠不关心”。1860年试图寄希望于太平天国失望后,容闳深知这一“教育计划”的实现必须结识显贵,只有通过政府。但他多年交往的官僚大多“虽然信服容闳的游说,赞助他的打算,但即使他们地位和权势煊赫,也不乐于把计划大胆提到朝廷,一切守旧势力会反对”。1867年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通过私人朋友关系将容闳教育计划“详细说明”送给在朝廷做官的朋友军机大臣文祥,但文祥不久丧居继而去世,容闳再次失望,这“使得他有时一半倾向于从此罢休”。容闳十多年的努力“挫折迎面扑来,是如此地频繁,如此地顽梗”。^{[1](代跋)}这说明封建统治集团对留学根本没有认识。1870年容闳作为翻译同曾国藩、丁日昌等处理天津教案乘机向曾提出,由曾、丁等人上奏朝廷,同年底准奏。试想,如果不是遇到镇压太平天国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而地位飚升的曾国藩,容闳的“留美教育计划”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曾国藩在封建地主官僚中算得上是一个有识之士且地位显赫,然而,像他这样权重一方智慧过人的封建官僚又有几个呢?更何况在1871年底第一批学生还未成行曾就去世了,这无疑使留美教育事务的正常进行在统治集团中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代之的李鸿章也只有洋务与顽固的保守势力上“焦悚莫名”(《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首鼠两端。“留美教育计划”在实施中缺乏有力的政治支撑力量,为它日后陷于孤立无助最后走向夭折埋下了伏笔。美国总统格兰德在得知幼童要被撤回时曾致函李鸿章:“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一》)李鸿章虽有动摇,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全部撤回。

封建阻力大还可从“留美学生事务所”的人事安排上看出。曾国藩、丁日昌和容闳等人深知西学与中学极其相左,“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势力,或事败于垂成”,必须“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1](191)}这已给出了两个涵义:一是“幼童留美教育”是先进的更是柔弱的;二是在凝固而浓厚的封建氛围下对它的成功性不是很有把握。因此,随第一批幼童赴美的“留学生事务所”的正监先后均由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区谔良、容增祥和吴子登担任^{[2](P146-147)},容闳任副监。利用翰林学士作保护以解除清廷和一切保守势力的疑虑和阻力,充分反映了留美教育计划在封建政治背景下的脆弱。

二、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任何思想观念的转变或一个新事物的产生,必须经过实践证明它的正确后才能被人们普遍认识和接受。幼童赴美学习是留学生之先,在整个社会对留学根本没有认识的情况下,人们自然对出国留学并不热衷。从招生的困难及所招生源的特点可以看出当时留学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1. 沿海地区学生居多。在120名幼童中,96%来自文化经济相对开放和发达的沿海地区。其中广东籍84人,占70%,而广东人中毗邻香港、澳门的香山县就有40人,占33.3%。^{[2](P117)}即使在沿海地区,招生也并不顺畅。在由政府负责留学生一切费用的前提下,人们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道:“那时的中国闭关自守,对世界事物一无所知……通过几万里的海洋将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随后将没有人能安全到达。尤其在农村,对外界了解少,没有学生敢出国。”(《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第24卷)人们对西方的无知使招生一开始就遇到麻烦,有的人报了名,“后来当地人散布流

言,说西方人野蛮,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消”。^{[3](P83)}使所计划名额迟迟不能招足。招第一批幼童时,容闳不得不亲自回到家乡南屏村作宣传,1871年夏要出发之前还未招齐30名,他又亲往香港“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与中西文有根柢者数人,以足其数”^{[1](P93)}。

最后成行的幼童和他们的父母们也不是有什么先知预见,而是他们的父母多少直接和间接了解或接触过外国人,见过一些世面。如邝荣光的父亲在澳门金矿当工人;唐国安的父亲年少时和容闳在香港同过学此时又正在从事洋务事业;李富恩受其在上海经商与外国人多有交道的堂兄的动员;詹天佑则是在香港做工的邻居极力向詹父推荐开导,并以其女许配给詹天佑作保证等等。^{[2](P112)}可见在沿海有认识者寥寥,这是“留美教育计划”缺乏广泛的社会认识基础。

2. 幼童家庭多系穷子弟。如上述邝荣光父亲在澳门挖矿,李富恩自幼丧父其母度日如年,詹天佑父亲经商破产生活常受人接济。又如封建官僚贬斥留美教育“所挑之幼童,多系贫贱小户子弟”,对中国封建纲常伦理“举无通晓”。(《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卷)从赴美幼童出国前,其父母必须给政府“具结”的内容看:“具结人×××今与具结事,兹有子×××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尚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同治×年×月×日,×××亲笔画押。”^{[2](P113)}“十五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皆不负责。”^{[1](P92)}这种近似于生死状的“具结”,在当时对外无所了解的情况下,稍有钱的人家是不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去“死”和冒险的。可以看出留美幼童及家庭是弱势群体。历史上任何时候权力总是远离贫穷,历来强势群体的声音强大而洪亮,弱势群体的声音孱弱而低哑。“幼童留美教育”的主体为弱势群体,使其在实施过程中来自清政府高层的支持力度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视程度和参与者的影响力及话语权等始终处于微若游丝随时可能会夭折的境地,这已决定了其成功的机率性是微小的。尽管当时这是一个政府行为。

三、留美幼童年齡太小,留学时间太长

中国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封建传统国家,重亲情,家乡观念和宗族意识浓厚。家长要把一个12—15岁还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孩子送到遥远而陌生的地方是不可思议的事,尤其在当时交通和邮政通讯都还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可以说一旦出国就音信杳无,15年里生死难料;“父母在不远游”的小农式文化传统是人们衡量子女是否“孝敬”的一个重要方面,培养孩子走“正道”也是每个家长的责任,因此“有出洋留学者,便被斥为非类”(《长葛县志》卷七);在当时生活及医疗水平很低,人均寿命不长的情况下,离开父母学习15年,无疑占去了人生的相当时间,人们不得不考虑此举是否值得。一个幼童在后来的回忆中就谈到当时人们的这些顾虑“父母很不希望让儿子出去离开他们那么长的时间,并且去到他们并不了解的而他们听说又是野蛮人居住的地方。”^{[2](P113)}家长对年幼的孩子出国忧虑更大。事实上,12—15岁的年龄,思想尚未成熟,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意识,即使今天对西方已有了解的情况下,从政府角度派出,这个年龄都是不合适的。改良思想家郑观应在充分肯定留美教育“意美法良”的同时,指出其教训是“稚齿髫年,血气未定”,跟什么就很快学到什么,“于中学毫无所得故也”,出国留学“过稚则气质易染,过长则口音难调。”最佳年龄在20岁左右。(《盛世危言·卷一·考试上》)。这些教训在1875年陆续派出留欧学生时得到完全改变,也是洋务运动派出留欧学习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四、“中学”和“西学”仕途不一

中国旧学历来注重“四书五经”内容,朝廷录用官员也只能是科甲正途出身。当官不仅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人们的羡慕,还会享受到一般人不能有的特权。自古人们望子成龙耀祖光宗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即使家财殷实的大户人家也念念不忘子弟通过科甲进入仕途。安徽歙县名商江终慕在督促儿子学

习时就说：“吾先世夷偏户久矣，非儒术无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贾竖子为也。”“期当于应科法程。”^[4]“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科甲”已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和人们心中得到广度和深度的认同，要出人头地显耀门庭，除了科甲仕途别无选择。

虽然洋务运动已经展开，但封建官僚却一直固守“中学”排斥“西学”，认为西方文化远逊中华文明，出国留学“弗乃下乔木而入幽谷欤？”^{[5] (P106)}。政府高级官吏检察御史张盛藻则更明确地在弹折中说：“朝廷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谈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门制造洋枪之理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卷）。随着洋务运动的需要，各地陆续奏请开设算学科、艺学科时，均要求朝廷给洋务学堂学生毕业后在仕途上有一席之地。李鸿章为此上奏：“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现在京师设同文馆，江苏亦选幼童出洋学习，似以辟西学门径，而士大夫趋向犹未尽属者何哉？以用人进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尽管洋务官僚对此呼声很高，但重用科甲正途轻视“西学”出身的风气不可能在当时有什么扭转。洋务运动中，科甲正途人员再进入同文馆学习天文科技知识时，出现了“凡士之考入者，人竟不齿”（《长葛县志》卷七）的情况。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没有完全改变，如留英回国的严复，在任天津水师学堂校长时还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仍想循正途来博取官爵挤入统治集团的上层^{[6] (第三卷)}。清朝统治者力主“朝廷必用科甲正途者”，使“中学”、“西学”仕途不同，决定了走“西学”只是一条死路，人们在作选择时自然是“中学”为上策，“洋务学堂”为下策，“出国留学”为下下策。

五、中美国情的两极大质差

欧洲较之北美保守，中国则较之欧洲保守，北美与中国处于两个极端的国家。中美两国的特殊国情也给幼童留美教育的“夭折”带来一定影响。在18世纪时亚当·斯密就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切贴地说出北美与英国的“绅士”之不同，他说北美大陆是“英国为它那些不安分守己的臣民，在遥远的地方买下了一大片土地”。^{[7] (P1)}从英国独立出来不久的美国，比它的宗主国更加开放自由。19世纪中期正是这些“不安分守己”的人处于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人人都充满着异想天开。1845年出版的《向俄勒冈与加利福尼亚移居者的指南》记述了1842年5月16日一支160人的队伍从密苏里州独立城启程西征的情况：“人人都摆出一副决意要管别人，而又不轻易让别人管的神气。在这里，我们处于无法无天、无拘无束的境地；处于低级社会的一片混乱、晕头转向和四分五裂的自然状态中！”^[7]这段文字虽然描述的是北美移民从东部向西部开拓的情景，却也可以说是“英国绅士”之于北美大陆“美国性格”的一个写照。

与美国处于另一极端的中国在19世纪正处于封建专制集权的顶峰，人们的思想和个性受到极大的束缚。然而正是中美国情的两极大质差，潜隐着幼童留美夭折的因素。从幼童亲身经历两国的学习和生活来看，我们不难理解留美幼童在美学习的艰难和变化。中国科举不仅内容陈腐，而且读书近二十年如笼中鸟，“从来没有独个儿向天空里飞过”，考场如“监牢”，考试时间昼夜不停，连考三场要7—8天时间，这种学习及考试形式对青少年是无情的摧残^[8]。洋务学堂也不会与之有多大不同，一位留美幼童回忆出国前在上海留美预备学堂补习的情景说：“当时他们没有网球、足球和篮球，也没有这么多的假日。那时只有中国阴历年、五月端午节及八月中秋节放假。故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多，而游戏的时间少。学校监督，是一位‘暴君’，他力主体罚，而且严格执行……恐惧他手上的竹板。”^{[3] (37卷)}考试成绩差者要受罚。这种形式也照搬到美国，即“肆习西学”必须“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幼童及随员例行向“留学生事务所”的孔子“至圣先师神位”“一体行礼”。（《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卷）此外，“保存辫发”和长衫马褂，留学生给留学监督下跪叩头等^[9]。从一个压抑的环境到一个尚自由重人性的环境要保持如此烦琐乏味的礼节，别说幼童，连成人都难以做到。幼童本身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强，到美不久纷纷要求剪发辫穿简洁的西装，而学习之外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如游泳、滑冰、自行车“种种健身运动，跳马驰骋”自由自在更

是吸引着幼童;博览西方的哲学、历史、政治、小说等“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幼童们的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1] (P102-103)}这是很自然的现象,诚如《纽约时报》所评论的,这些聪慧的幼童如果“仅由工程、数学、科学的领域中已得到满足,而他们对美国政治及社会的影响而无动于衷,则将是不可思议的事”^[3]。留学生不可避免地受着新鲜自由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感染,西方的思想和社会习俗潜移默化逐步深入幼童的头脑。

对留美幼童的正常变化,国内士大夫议论纷纷。1881年留美学生正监陈兰彬、吴子登等人上奏,以“外洋风俗,流弊多端”,留学生“沾其恶习”防不胜防为由,建议“极应将局裁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卷)是夏,清政府撤回全部留美学生,9月6日从旧金山登船,同年11月6日抵上海。^{[2] (P150-155)}

历史上第一批幼童留美教育虽然夭折了,但出国留学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是深远的,事实证明它对中国后来的历史起了重大的影响。洋务运动中继派幼童留美之后,清政府陆续派遣了几批留欧学生,甲午中日战后清政府又开始恢复派遣留美学生。从此,一批批留学生出国学习,不仅是学习“器数工艺”,更重要的是接触到西方的“政教义理”,“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刻不容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4] (P110)}。西方先进思想在中国上层社会和有识之士中逐渐形成一股充满生机的暗流,在20世纪初期掀起了中国留学生运动高潮。迄今,派遣留学生已成为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运动幼童留美教育并没有失败。

参 考 文 献

- [1]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2] 李喜所. 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M].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0.
- [3] 刘真. 留学教育(第一册)[M]. 台湾国立编译馆, 1980.
- [4] 陆贤涛. 徽商家庭教育的思想和方法[A].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J], 2004, (6).
- [5] 李圭. 环游地球新录[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 [6] 朱文志. 民国人物集[C]. 中华书局, 1981.
- [7] [美] 丹尼尔·布尔斯廷. 美国人开拓历程[M]. 三联出版社, 1993.
- [8] 骆憬甫. 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浮生手记”清末乡试亲历[A]. 文汇读书周报[N], 2005-01-07.
- [9] 华人留学美洲之今夕[A]. 东方杂志[J], 第14卷第12号.